

# 财政支农真的能促进城乡共同富裕吗

## ——基于城乡异质性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宋永华<sup>1</sup> 陈昌兵<sup>2</sup> 杨祥雪<sup>1</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1024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内容摘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实施财政兴农举措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城乡发展二元化的经济现实构建了含有政府的城乡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政策冲击反应和乘数分析了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的财政支农举措对促进城乡经济发展和缩小城乡经济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政策在促进城乡经济共同富裕方面效果较好,政府性基金支出支农的政策效果则与资金筹集方式有重要关系。根据经济模型模拟结果及目前财政支农具体现实,本文认为应提升支农资金利用效率,改善当前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并对财政支农补贴政策适时做出动态调整,以实现财政支农更好地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目标。

**关键词:** 城乡共同富裕 城乡二元经济 财政支农 异质性 DSGE 政策乘数

中图分类号:F812.45;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22)02-115

DOI:10.19626/j.cnki.cn31-1163/f.2022.02.009

###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强调,“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谓富裕,强调的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and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谓共同,强调的是全体人民能平等地享受发展成果,实现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同样要从富裕和共同两个方面入手,扭转当前城乡对立关系,破除城乡二元发展格局。这要求政府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实施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在促进城乡产出、消费和投资增长的同时缩小城乡产出、消费和投资差距,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为目标,切实落实“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策略,引导要素资源在城乡合理配置,最终形成城乡经济共同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统一协调发展的局面。

现阶段,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尽管近年来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不断改善,但城乡两区域在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人力资本等

收稿日期:2022-1-20

作者简介:宋永华(1996—),男,山东威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财政学;陈昌兵(1966—),男,江苏如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人工智能经济学;杨祥雪(1994—),女,山东临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投资经济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政策、农业经济。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方面的绝对差异扩大趋势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38万元和1.7万元,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分别为3.4万元和1.6万元,农业占GDP总产值的比重由2001年的14%下降至2020年的7.7%。城乡二元化发展格局的日益巩固导致推进共同富裕面临难题。城乡二元化状况的形成原因复杂,除自然条件和市场因素外,政府的宏观调控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以前,在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思路指导下,政府通过计划强制的手段将资源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形成了“农业输血工业,农村输血城市”的城乡关系格局,这在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的同时削弱了农村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后,市场的作用越发强大,在以GDP总量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激励下,政府“有形的手”往往会依市场“无形的手”方向行事,即要素资源愈向城市集中,政府的注意力就越关注城市,在城乡间产生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这使城乡二元化格局进一步巩固。

当前,我国正处于开启十四五规划、构建经济新发展格局、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不能使5亿农村居民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掉队。纵观现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大多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推进有利于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政策,例如日本从1948年开始的“农村生活改善普及事业运动”和二十世纪60年代推进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及韩国从70年代推行的“新农村运动”,这些都是以政府主导保证实施,综合运用了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及产业扶持等多种政策手段,促进了农村产业、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发展,并最终促进了农村富裕、城乡协调和经济总体快速发展。我国政府作为解决当前国内城乡二元化问题的主导力量,应当在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政府配置城乡资源的作用,弥补市场调控资源的固有弊端,以政府财政为支撑落实有力的支农举措,推进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梳理当前的财政收支结构才能分析政府如何通过财政资源重新分配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目前我国的财政收入主要分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是政府财力的最主要支撑。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主体是税收,根据聂海峰、岳希明(2013)的测算,在间接税为主的税制模式下城乡居民的人均税负分别是10.99%和9.42%,总体差别不大。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城乡分配则表现出较大差异,按照曾国安、胡晶晶(2009)的测算,1978—2005年城乡部门的单位产值耗费的财政支出年均值分别为0.22元和0.08元,城乡居民人均财政支出的年均值分别为1795.2元和85.6元,考虑到2005年以前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在财政中占比较低,这个比例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在城乡生产生活领域的分配情况。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主体则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出让的土地大部分是由农村集体用地转化而来,并用于承载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相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的城乡分配也存在重城轻乡倾向,剔除征拆迁补偿支出后,2010年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用于城乡比重分别为52.1%和5.6%;2014年这一比重变为44.3%和5.4%(许光建、卢倩倩、许坤、张瑾玥,2020)。此“重城轻乡”的分配倾向极大地损害了农村的利益,也不与“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导向一致。几十年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为城市产业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提供了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但财政资金的利用也存在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长期的投入导致增量财政资金对城市生产促进水平不高并且对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不明显。与城市地区冗余财政资金相对应的是农村地区的财政资金不足,这导致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相对落后,从而对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但相对地,农村地区财政资金的边际利用效率较高,即农村地区增量的财政资金配置可以更高效地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农业发展。在城乡财政资金利用存在边际效率差异的情况下,通过财政支农提高财政资源的边际利用效率的方式可以实现财政资源总体利用效率的提高,并缩小城乡两地生产和居民生活方面的差距。

实现财政支农要使农村地区获得更多的财政资金,主要有两种手段,一种是调整现有财政资源的城乡分配比重,另一种是在财政资源分配比重不变的前提下扩大财政收入总量。前一种方法更具普遍性,原因在于在税收法定的规范下,政府难以控制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数额,但政府可以调整财政预算编制,结合地方实际根据城乡具体项目建设规划,调整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具体科目财政资金城乡分配,实现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支农。同时政府可以调整政府性基金收入相关支出在城乡具体项目中的投入数量实现支农目标。而实现增量财政资金支农则只能通过政府性基金渠道实现,在当前政府垄断土地供应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提升土地出让价格和土地融资的方式获得增量资金以增加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数量。在支农资金的具体落实上,政府可以依托财政资金对农村家庭的生产生活进行补贴,也可以通过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兴建项目的形式将财政资金投入到农村生产相关领域,通过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来实现财政支农目标。本文剩余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是文献综述;第二是模型构建;第三是参数赋值和脉冲响应分析;第四是从乘数的角度对政府财政支农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效果进行估计;第五是政策建议。

## 二、文献综述

过去一段时间,在户籍制度、粮食配给及对人口流动严格控制的影响下,城乡差异不断巩固,致使城市和乡村成为了两个不同的经济体(Barry Naughton, 2006),乡村的欠发达对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和经济总体发展造成了相当的阻碍,因为无论是对稳态值还是对趋于均衡的内生动力系统来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都对社会“真实”经济变量(即  $y^*$ ,  $k^*$ ,  $l^*$ )有着深远的影响(Sato Ryuzo & Davis Eric G, 1971),因此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的重点关切。破除当前城乡二元化格局以释放改革红利,提高城乡发展一体化程度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既是当前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也是促进经济稳定均衡恢复的基本要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课题组, 2014)。与此同时,农村地区结构变化也是若干相关国际关切的根源。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各国政府在通过政府财政政策缓解城乡差距方面的进展仍十分有限(Andrés Rodríguez-Pose & Daniel Hardy, 2015)。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及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政府财政的角度对财政兴农相关政策的发展、差异和影响展开研究(孙秀林、周飞舟, 2013; 陶然、徐志刚, 2005; Jingzhong Ye, 2015)。但现有文献中财政兴农政策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尚未形成定论。部分学者认为财政兴农能带来积极的政策效果,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支农补贴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并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最终通过提升农村地区发展水平的方式达到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目的(朱迎春, 2013);另一方面是因为改变财政资金现有的城乡分配格局能够起到有效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的作用(罗东、矫健, 2014)。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财政兴农政策带来了消极的政策效果:因为财政补贴的支农效果容易受价格机制的逆向调节作用的影响,财政农业补贴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产量的同时,也会导致农产品价格降低,进而产生“谷贱伤农”的生产效应(李普亮, 2012),这将使农产品产量提升的福利报酬由于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而逆向转移到城市非农劳动者手中,使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对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和实际消费水平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造成城乡二元化格局进一步深化(马晓河, 2020)。

综上所述,以往文献对我国财政兴农政策效果进行了广泛研究,对促进经济结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政府财政支农作用城乡经济的机制究竟如何、会取得怎样的效果等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涉及财政支农政策对城乡共同富裕影响的文献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为研究财政支农促进城乡经济结构改善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效果,本文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通过构建包含城市、农村、政府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财政预算内收入支农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农的政策举措

的影响,并根据脉冲响应和乘数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意见,既补充了既有文献分析财政支农政策效果的工具,也为财政兴农政策实施方向及手段选择提供了定量方面的依据。

### 三、构建城乡异质性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经济结构就是经济体或市场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供给或需求目的,将劳动、资本、技术和自然资源在时间、空间上进行配置的比例关系(马晓河,2020)。因此本文在刻画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时,主要以城乡政府财政、资本和劳动的数量和结构差异来进行区别,反映了城乡地区政府组织效率和受重视程度差异及城乡产业结构差异导致的要素配置比例关系差异。除却经济结构差异外,城乡居民在生产生活中具有不同的土地禀赋这一点同样是城乡差异的重要表现,城市地区居民为维持自身生产生活需要支付一定的土地出让金给政府来获取土地,而农村居民的禀赋则是其天然禀赋,这也由此引出了本文在模型设定中政府向城市家庭供给土地并获取土地出让收入这一重要假设,解决了当前大部分模型忽视政府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这一重要因素的问题。模型具体框架如下:

#### (一)城市地区

城市地区家庭的效用函数中  $C_t^1$  代表城市家庭的消费,  $\omega^1$  代表劳动厌恶系数,  $L_t^1$  为家庭劳动力,  $\psi$  为城市家庭的土地跨期替代弹性,  $F_t^n$  为土地需求数量,城市地区家庭效用函数与农村存在的最大差别是土地,对于农村居民来讲,土地是自然具有生产和生活禀赋,无论是集体土地还是宅基地,农村居民具有法律规定和实际意义上的使用权,而城市居民则不具备这种权利,因此居民必须在家庭收入中划分一定比例用于购买土地,持有的土地也是影响家庭效用的重要因素。在中央政府的集中管制下,土地的供给完全没有弹性,即土地供给的数量是既定的,因此城市地区家庭的土地需求由土地供给量决定,地方政府不能调整土地供给数量但能调整土地价格。

$$U^1 = \ln C_t^1 - \omega^1 L_t^1 + \frac{(F_t^n)^{1+\psi}}{1+\psi}$$

城市地区代表性家庭约束如下,家庭将税后收入分配到消费、投资和土地购买中,其中  $I_t^1$  为当期投资,  $p_t^f$  为土地购买价格,  $W_t^1$  为当期工资率水平,  $R_t^1$  为当期资本回报率水平,  $K_t^1$  为当期资本存量,  $\delta$  为折旧率水平,  $\tau^{ul}$  为城市地区劳动税收水平,  $\tau^{uk}$  为城市地区资本税收水平。

$$C_t^1 + I_t^1 + p_t^f F_t^n = (1 - \tau^{ul}) W_t^1 L_t^1 + (1 - \tau^{uk}) R_t^1 K_t^1$$

$$I_t^1 = K_{t+1}^1 - (1 - \delta) K_t^1$$

本文在生产环节设置了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生产两个部分,这借鉴了 Michael P. Evers(2015)的做法,城乡两地分别垄断当地中间品生产,通过贸易实现产品转移,两地厂商分别加工两地中间品生产最终产品,以满足当地的居民生产生活需求,中间品比例的选择存在地区偏好,两地最终产品不可贸易、不可相互替代,并以最终产品作为两地产出数量的衡量标准。假设城乡地区分别投入劳动、资本及财政支出生产中间产品,中间产品的产量与技术有关,其中劳动和资本来源于该地区代表性家庭,财政收入来源于税收和土地出让,政府将财政资源在区域间的重新调配,中间品厂商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函数进行生产,其中  $M_t$  为城市生产的中间品,  $A_t$  为技术水平,  $G_t^1$  为政府财政投入,  $m_t^1$  和  $m_t^2$  分别为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使用的中间产品的数量。在生产环节对城乡经济结构的区分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下的劳动—资本结构差异和政府投资数量和效率实现的,城市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生产中资本相较农村占比更高,政府投资效率更高、数量更多。

$$M_t = A_t (G_t^1)^{\alpha^1} (K_t^1)^{\alpha^1} (L_t^1)^{1-\alpha^1}$$

$$M_t = m_t^1 + m_t^2$$

最终品厂商按照一定比例使用两地生产的中间品来生产最终产品,生产函数为 CES 的形式,

$y_i^1$  为当地最终品生产数目,  $m_i^1$  和  $n_i^1$  分别为来自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中间产品,  $\theta$  用来表示两种中间品在最终生产函数中的比例, 由于地区偏好的存在, 本地中间品比例较高, 即  $\theta > 0.5, \rho > 0$  为两种产品的替代弹性。

$$y_i^1 = [\theta (m_i^1)^\rho + (1 - \theta) (n_i^1)^\rho]^{\frac{1}{\rho}}$$

## (二) 农村地区

农村家庭效用函数如下, 其中  $C_i^2$  为农村家庭消费,  $L_i^2$  为家庭劳动力,  $\omega^2$  为农村地区代表性家庭劳动厌恶系数, 与城市不同, 在差异化土地制度的背景下, 农村地区的居民依靠自有宅基地解决基本需求, 不需向政府额外购买土地。

$$U^2 = \ln C_i^2 - \omega^2 L_i^2$$

农村地区居民的约束, 在消费、投资及各种要素回报方面与城市家庭基本相同, 相关参数除上角标外含义相同, 与城市存在一定区别的是, 农村除获得地区劳动收入外, 还会收到政府针对性的补贴,  $GZ$  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针对农村的补贴, 假设这种补贴是根据农村现有的劳动收入数额和资本收入数额进行比例补偿, 其中  $u^1$  为资本收入的补贴份额,  $u^2$  为劳动收入的补贴份额。

$$C_i^2 + I_i^2 = (1 - \tau_i^k) R_i^2 K_i^2 + (1 - \tau_i^l) W_i^2 L_i^2 + GZ_i$$

$$I_i^2 = K_{i+1}^2 - (1 - \delta) K_i^2$$

$$GZ_i = u_i^1 R_i^2 K_i^2 + u_i^2 W_i^2 L_i^2$$

农村中间品厂商生产与城市一样, 农村的中间品厂商以政府投资、资本和劳动生产中间产品, 中间品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最终品厂商使用两地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 生产函数为 CES 形式。

农村中间品厂商生产函数如下:

$$N_i = A_i (G_i^2)^{\alpha^2} (K_i^2)^{\alpha^2} (I_i^2)^{1-\alpha^2}$$

$$N_i = n_i^1 + n_i^2$$

农村地区最终品厂商生产函数如下:

$$y_i^2 = [(1 - \theta) (m_i^2)^\rho + \theta (n_i^2)^\rho]^{\frac{1}{\rho}}$$

## (三) 政府

政府通过征税、出卖土地的方式进行融资, 政府的预算约束如下, 其中  $G_i$  为财政支出总数,  $GL_i$  为政府基金收入,  $GT_i$  为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F^s$  为土地供给数量, 假设针对农村的补贴在财政资源城乡分配之前分配。

$$GT_i + GL_i = G_i$$

$$GT_i = \tau_i^l (W_i^1 L_i^1) + \tau_i^k (W_i^2 L_i^2) + \tau_i^k (R_i^1 K_i^1) + \tau_i^k (R_i^2 K_i^2) - GZ_i$$

$$GL_i = p_i^f F_i^s$$

$$F_i^s = F_i^n$$

由于以税收为主的预算内收入和以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主的政府基金收入在收入方式和分配自主权上存在较大不同, 所以在假设政府对两项财政收入分别计算, 其中  $gt_i^1$  为城市地区分配到的预算内财政收入,  $gt_i^2$  为农村地区分配到的预算内财政收入,  $gl_i^1$  为城市地区分配到的土地出让收入,  $gl_i^2$  为农村地区分配到的土地出让数量, 分配权重分别为  $\phi$  和  $\pi$ , 城乡财政资源总投入分别为  $G_i^1$  和  $G_i^2$ 。

$$gt_i^1 = \phi GT_i; \quad gt_i^2 = (1 - \phi) GT_i$$

$$gl_i^1 = \pi GL_i; \quad gl_i^2 = (1 - \pi) GL_i$$

$$G_i^1 = gt_i^1 + gl_i^1; \quad G_i^2 = gt_i^2 + gl_i^2$$

(四)一般均衡和外生冲击

$Y_t, Y_t^1$  和  $Y_t^2$  分别是城乡总产出、城市产出和农村产出,  $q_t^m$  和  $q_t^n$  分别为对城市和农村中间产品的需求。

$$\begin{aligned} C_t^1 + I_t^1 + G_t^1 + q_t^m m_t^2 - q_t^n n_t^1 &= Y_t^1 \\ C_t^2 + I_t^2 + G_t^2 - q_t^m m_t^2 + q_t^n n_t^1 &= Y_t^2 \\ Y_t^1 = q_t^m M_t; Y_t^2 = q_t^n N_t; Y_t &= Y_t^1 + Y_t^2 \end{aligned}$$

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影响农村农业的渠道主要可以分为一般预算支出渠道和政府性基金支出渠道,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主要是通过补贴农村家庭要素收入影响生产生活活动和调整一般公共预算城市分配比例实现的, 由于后者直接作用于农村生产函数中的政府投资数量, 因此将其称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生产性支农。设置财政对农村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补贴冲击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生产性支农冲击如下:

$$\begin{aligned} u_t^1 &= \rho^u u_{t-1}^1 + \epsilon^u \\ u_t^2 &= \rho^u u_{t-1}^2 + \epsilon^u \\ \phi_t &= (1 - \rho^\phi) \bar{\phi} + \rho^\phi \phi_{t-1} + \epsilon^\phi \end{aligned}$$

政府性基金相关收入支农主要是通过土地出让资金增量和存量调整实现农村地区分得的政府性基金增加实现的。由于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主体是土地出让收入, 因而实现政府性基金支农就是要扩大土地出让收入分配中农村获得的数量, 这要从增量和存量两个角度考虑。从增量看, 在土地出让收入城乡分配比例不变的情况下, 提升土地出让单价或通过土地金融实现土地出让总收入的扩张, 进而实现土地出让收入中农村分配的数量增加, 其中土地金融设置为盯住当地城乡产出相机抉择的形式。从存量看, 在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维持稳定的基础上, 调整土地出让城乡分配比重, 实现农村地区分得更多的土地出让资金。综合上述两种考虑, 设置土地出让收入影响农村经济的波动如下:

$$\begin{aligned} p_t^f &= \rho^p p_{t-1}^f + \epsilon^p \\ GL_t &= \rho^G GL_{t-1} + (1 - \rho^G) (\overline{GL} + \kappa \frac{Y_t}{Y}) + \epsilon^G \\ \pi_t &= (1 - \rho^\pi) \bar{\pi} + \rho^\pi \pi_{t-1} + \epsilon^\pi \end{aligned}$$

根据模型框架分析财政支农实现农村发展的作用机理。上述六种政策冲击作用农村区域主要分为财政补贴和财政生产性投资两种形式, 其中财政补贴的主要作用对象是农村家庭的收入, 财政生产性投资的作用对象是农村产业, 两者都提升了农村地区的财政资源丰度, 但在目标实现机理上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财政对农村居民收入的补贴政策直接增加了农民的可支配收入, 进而提升了农民的消费和投资水平, 这提升了居民的生活水平, 并且生产性要素的积累也为居民后续收入的提高打下基础, 从而形成了一个正向反馈的循环。与财政补贴这种直接实现农民收入增加的政策不同, 财政生产性投资促进农民增收是通过产业发展实现的, 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农村地区, 完善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从而促进了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 这增加了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从而实现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持续增收的政策目标。在促进农村生产同时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方面, 尽管冲击中关于存量财政资源的城乡重新配置并非帕累托改善, 其通过提高财政资源的边际利用效率的方式实现财政资源总体利用效率的提高, 实现了缩小城乡两地产出和居民生活方面差距的政策目标, 并且在城乡间要素流动的影响下, 城乡产品皆为城乡两地生产生活所需, 农村产出的提高为城市提供了生产生活所需的产品, 而农村消费的增加则为城市生产创造了需求, 城市产出和消费的提高对农村的作用亦然, 因而财政资源的农村倾斜在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的同时也间接促进城市地区的发展, 从而实现了城乡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 四、参数校准和模拟结果分析

### (一) 参数校准

本文需要校准的参数包括  $\{\beta, \delta, \alpha^1, \alpha^2, \mu^1, \mu^2, \theta, \omega^1, \omega^2, \psi, \bar{\phi}, \bar{\pi}\}$  和冲击相关参数  $\{\rho^{u^1}, \rho^{u^2}, \rho^{\phi}, \rho^{\pi}, \rho^G, \rho^p, \epsilon^{u^1}, \epsilon^{u^2}, \epsilon^{\pi}, \epsilon^G, \epsilon^p, \epsilon^{\phi}, \kappa\}$ 。文献中对于主观折现率水平  $\beta$  的取值多集中在 0.9 至 0.99 这一范围内, 本文将其取值定为 0.96, 与现实中近 20 年储蓄存款年利率水平约为 4% 的经济实际相符。 $\delta$  为年折旧水平, 参考陈昌兵(2014)的研究将其设置为 0.05, 这也是目前文献的主流取值。城乡资本产出弹性  $\alpha_1$  和  $\alpha_2$  参考高帆、李童(2016)的研究将其分别设置为 0.64 和 0.34, 这种资本产出弹性的差异反映了城乡经济结构上的不同, 城市二三产业相较于我国目前普遍存在小农经营式的第一产业有更强烈的资本需求, 因而反应为城市生产中劳均资本值更大。关于政府支出弹性  $\mu_1$  和  $\mu_2$ , 国内外文献设定大都在 0.1~0.5 之间, 饶晓辉、刘方(2014)将其设置为 0.1, 饶晓辉(2017)将其设置为 0.5, 王文甫等(2020)在两部门模型中将发达地区设置为 0.1, 欠发达地区设置为 0.15, 本文参考上述取值范围, 在考虑到城乡间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和治理模式差异, 将城市地区的政府支出弹性设置为 0.25, 将农村地区设置为 0.1。最终品厂商生产最终产品使用中间品相对比重  $\theta$  参考 Michael P. Evers(2015)的研究, 认为当地最终产品主要由当地产品加工而成, 这与中国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下实际经济关系类似, 将其设置为 0.75。产品替代弹性  $\rho$  参考朱军、许志伟(2018)的研究将其设置为 2。政府预算内收入的财政分配系数  $\phi$  根据农村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设置为 0.8, 这个比重根据财政数据计算而来。政府性基金收入城市分得的数额根据许光建等(2021)的研究设置为 0.9。参照朱军、许志伟(2018)的方法, 调整城乡家庭的劳动厌恶系数, 将城乡产出比重依据现实中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与第三产业产值之和的比例调整为一比十, 校准得到  $\omega^1$  和  $\omega^2$  分别为 1 和 0.25。对城镇居民购买土地的跨期替代弹性  $\psi$  数据, 由于国内对居民土地跨期替代研究较少, 本文参考了部分模型对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研究结果将其定于 1.5, 在稳健性检验中发现该值的取值对模型冲击影响较小。在稳态税率方面, 在间接税为主的征收模式及社会化生产带来的商品流通的情况下, 城乡居民的税负水平差距不大, 参考梁红梅、张卫峰(2014)对我国总体税负的研究结果, 分别将农村资本税率和劳动税率设置为 0.248 和 0.126。在外生冲击参数方面, 在支农补贴方面, 将政府针对城乡居民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财政补偿冲击的自回归系数统一设置为 0.9, 为了按照统一标准对不同政策的效果进行比较, 政府财政支农其他政策冲击的自回归系数参考 Michael P. Evers(2015)的研究统一取 0.84, 标准差统一取 0.001。土地出让收入对产出的反馈系数参考张明源、薛宇择(2020)的研究取 0.37。

### (二) 模拟结果及分析

#### 1. 财政支农促进“富裕”的脉冲响应结果

本节分析了财政支农政策在促进城乡“富裕”即总产出、总消费和总投资增加方面的脉冲响应结果。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方面, 针对农村劳动和资本收入的补偿政策和生产性支农政策对总产出、总消费和总投资产生了较为显著地正向冲击, 其中针对农村劳动收入的财政补偿政策比针对资本性收入补偿的政策持续时间相对更长, 正向刺激更为明显, 政策效果相对更好, 而生产性支农政策则在刺激总产出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在政府性基金支农方面, 通过土地出让金城乡存量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效果更为明显, 刺激了总产出、总消费和总投资的提升。而通过提升土地出让总收入来增加土地出让金支农数目的政策效果存在较大反差, 其中通过土地抵押融资等土地金融手段实现土地出让收入扩张的财政政策对总产出、总消费及总投资的影响同样为正向, 而通过地价上升来实现土地出让收入扩张的财政政策则对民间主体的投资和消费行为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挤出作用并对产出产生了负面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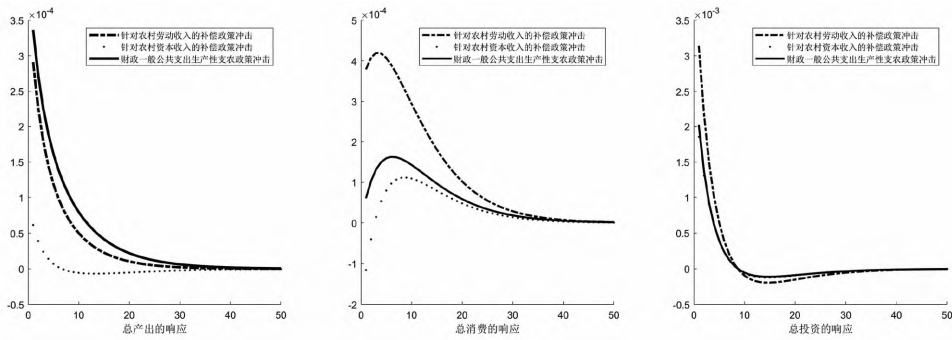


图 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对总产出、总消费和总投资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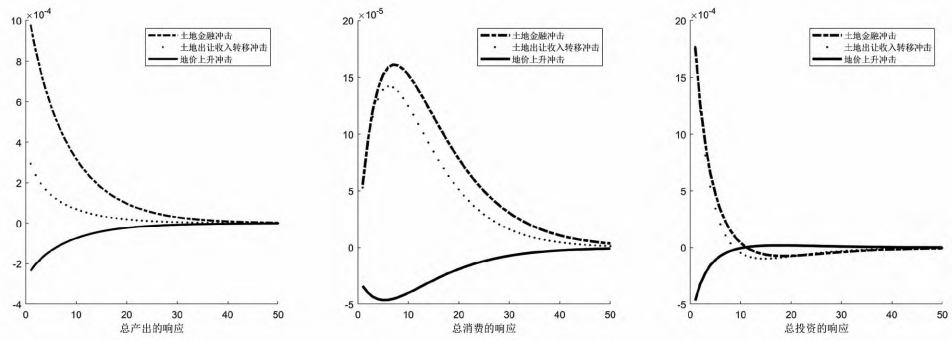


图 2 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农对总产出、总消费和总投资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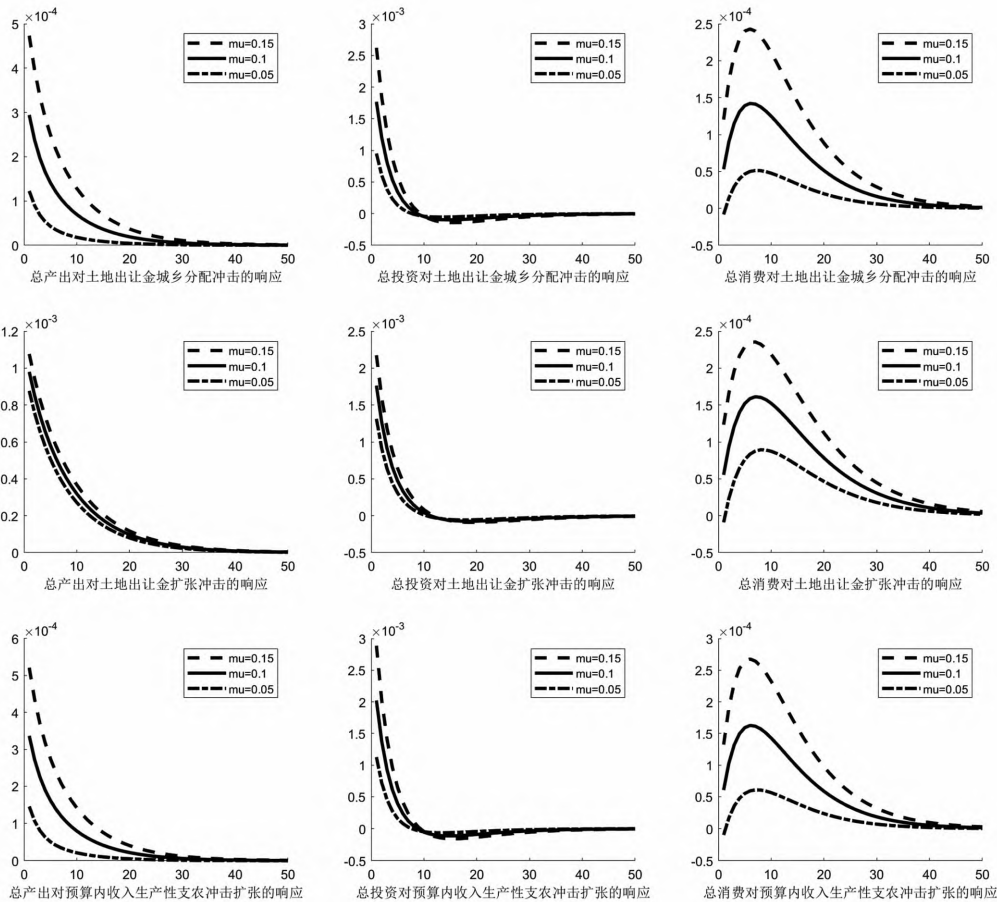


图 3 政府不同投资效率下一般公共预算支农生产性支农冲击的响应



与政府预算内收入补贴农民生产性收入行为不同,政府性基金收入中通过将土地出让收入转移到农村的支农方式和一般公共预算内收入生产性支农多以政府投资兴建基础设施或直接进行产业扶持的方式进行,这在强调财政支农数量的同时,也对政府的投资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模拟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农村政府投资效率下,相同变量面临相同冲击所产生的脉冲反应大小和持续时间有所不同。以政府投资产出弹性为标准衡量农村地区政府投资效率,分析政府财政直接对农业进行生产性扶持的效果,当  $\mu^2$  分别取 0.05、0.1 和 0.15 的脉冲反应结果如下,  $\mu^2$  值越大,正向反应越明显持续时间越长,即在相同财政支农产业投资数目水平下,乡村政府投资效率越高,支农效果越明显,说明提升支农生产资金的利用效率与提升支农资金的数量一样重要。

2. 财政支农促进“共同”的脉冲响应结果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城乡共同发展中缩小城乡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因此本文在此部分分析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收入相关支出支农政策促进“共同”即对缩小城乡产出、消费和投资的效果。设置衡量城乡产出、消费和投资差异函数如下,其中  $\Delta Y_t$ 、 $\Delta C_t$ 、 $\Delta I_t$  分别为城乡产出、消费和投资差距。

$$\Delta Y_t = Y_t^1 - Y_t^2$$

$$\Delta C_t = C_t^1 - C_t^2$$

$$\Delta I_t = I_t^1 - I_t^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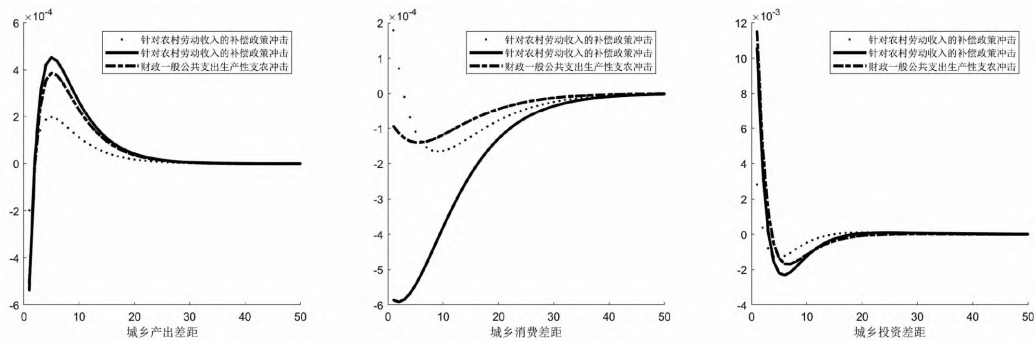


图 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对城乡产出、消费和投资差距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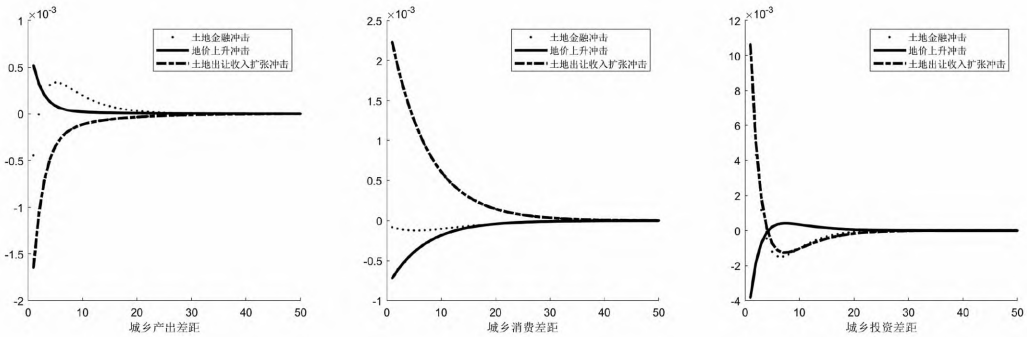


图 5 政府性基金支农对城乡产出、消费和投资差距的影响

在产出方面,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的政策选择在极短时间内缩小了城乡的产出差距,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由于政策持续时间较短,在中短期内城乡产出差距出现扩张趋势后逐渐回归稳态,而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农的政策选择则各有特点,其中通过土地出让收入扩张来获得支农资金的冲击显著缩小了城乡产出差异,地价上升支农的政策选择则使城乡产出差异扩大,而土地出让收入城乡重分配的政策则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的政策相同,在前期扩大了城乡差距并在中长期出现反弹。与产出不同,一般预算支出支农的各项政策选择在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方面无论在短期还是在中长期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政府基金收入支农的政策中地价上升和土地出让收入

城乡重分配与预算内收入支农的政策反应基本相同,但效果不明显,土地金融的政策选择使城乡消费差距扩大。在投资方面,一般预算支出支农的政策选择及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农中的土地出让收入城乡重分配和土地金融政策在中短期缩小了城乡投资的差距,而地价上升冲击持续地缩小了城乡投资差距。

### 3. 脉冲响应总结

结合上述脉冲分析结果来看,支农资金的筹措方式对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重要影响,通过预算内收入支农的政策选择及政府基金收入支农中的土地出让收入重新分配对总产出、总投资和总消费有显著的正面刺激作用,而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农中通过土地出让增量收入支农的两种政策则效果存在较大差异。而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的政策三者作用大致相同,但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农的政策则差异明显,其中通过提升地价获取支农资金的政策选择对城市地区的消费和投资产生明显的挤出作用,这与城乡兼顾的政策目标相悖,说明通过增量收入获取土地支农资金的过程中,应注意资金来源的选择,避免出现“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要统筹财政支农与城乡协调发展。同时,在关注支农方式选择和财政支农数目的同时,也应关注政府投资效率,提升支农生产投资效率对提升财政支农效果促进城乡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 五、支农政策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乘数分析

由于脉冲响应分析主要关注政策发生后相关变量的相对变动值,因而其在度量并比较相关政策影响方面存在一定的抽象性。为更直观地表现政策的影响,本文采用乘数分析进行进一步分析,乘数指每单位外生变量的变化引致的内生变量变动情况。与脉冲响应相比,乘数更能体现某一政策的变动对关键变量的影响,例如在分析土地出让收入向农村转移这一政策过程中,乘数能回答“每单位的政策变动能拉动城乡产出、投资、消费总额增加多少和能缩小城乡产出、投资、消费差距多少”这样的问题,同时能更加直观统一地比较不同政策的效果,因而有利于政策评估工作的进行。

在具体计算过程中,本文除关注政策因素影响产出这一最终变量外,还关注消费和投资活动受政策变动的的影响,因此除计算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对产出的乘数效应外,还对政策影响的城乡居民的消费和投资行为的乘数效应进行了分析。从共同富裕层面出发,本文计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农政策对城乡产出、消费和投资增加和差距缩小的乘数效果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由于无法获得乘数计算的显性表达式,在计算公式方面本文参考了 Andrew Mountford 和 Harald Uhlig(2005)及 Sarah Zubairy(2014)的研究,以折现后的现值计算乘数,计算公式如下。其中折现率  $r$  使用城乡居民家庭折现率,  $H$  分别代表产出  $Y$ 、消费  $C$  和投资  $I$  及城乡产出、消费和投资差距  $\Delta Y$ 、 $\Delta C$ 、 $\Delta I$ ,  $G^h$  代表财政支农政策变动。

$$\frac{\Delta H}{\Delta G^h} = \frac{E_t \sum_{i=0}^k (\prod_{z=0}^i r_{t+z}^{m-1}) \Delta H_{t+i}}{E_t \sum_{i=0}^k (\prod_{z=0}^i r_{t+z}^{m-1}) \Delta G_{t+i}^h}$$

表 1 是财政支农政策在刺激城乡“富裕”,即产出、投资 and 消费增加层面的乘数计算结果。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方面,对农村要素收入的补偿政策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生产性支农乘数对总产出的影响为正值,三者相差不大,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对农村居民劳动的补贴政策乘数效应更为明显,但三者的产出乘数皆未超过 1,说明政策在刺激总产出方面作用有限。而在消费和投资方面,针对要素回报的减税政策对总消费和总投资的乘数效应则更为明显,即财政内收入变动政策在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调整经济结构方面效果更为突出。具体看,两者在前期多是以撬动总投资为主,后期以撬动总消费为主,政策效果皆大于 1,即单位数量的变动能促进总投资和总消

费更多数量的增加,以均值和极值进一步分析这两项在政策周期内的稳定性,针对农村劳动的财政补偿政策在刺激总消费方面效果更佳,而针对劳动资本的补偿政策则在刺激总消费方面有更强和更稳定的表现。相对上述两者,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生产性支农的效果对刺激总消费和总投资方面影响有限。

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要内容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变动的不同政策表现存在较大差异,土地收入城乡重分配政策在刺激产出方面有一定效果,但乘数效应小于 1,该政策对刺激消费和投资方面作用有限。以土地金融形式实现土地出让收入总量扩张政策对总产出刺激效果显著,其乘数效应长期大于 1,并且该政策在前期刺激投资和后期刺激消费方面表现也较好,但乘数效应低于 1。而通过提升地价募集支农资金的政策则对产出、消费和投资都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表 1 财政支农促进“富裕”乘数计算表

一般预算支出支农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大值	政府性基金支农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大值		
资本收入 补偿政策	产出	0.18	-0.09	0.04	0.18	土地出让 收入城乡 重分配政策	产出	0.18	0.21	0.18	0.21
	消费	-0.36	1.86	0.71	1.86		消费	0.03	0.39	0.21	0.39
	投资	1.52	-0.27	0.63	1.52		投资	0.30	-0.04	0.11	0.30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大值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大值		
劳动收入 补偿政策	产出	0.44	0.52	0.46	0.52	土地金融 支农政策	产出	1.72	1.53	1.59	1.72
	消费	0.62	3.28	1.84	3.28		消费	0.10	0.78	0.46	0.78
	投资	1.34	-0.28	0.57	1.34		投资	0.86	0.06	0.37	0.86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大值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大值		
生产性 支农政策	产出	0.23	0.26	0.24	0.26	土地价格上 升支农政策	产出	-0.13	-0.20	-0.16	-0.13
	消费	0.04	0.51	0.27	0.51		消费	-0.02	-0.11	-0.06	-0.02
	投资	0.39	-0.05	0.15	0.39		投资	-0.07	0.00	-0.03	0.00

表 2 是财政支农政策在促进城乡“共同”即产出、消费和投资差距缩小方面的乘数计算结果。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农方面,针对农村要素补偿对缩小产出差距方面作用明显但相对较短,并在中后期出现了政策反弹扩大了产出差距,且后期反弹效果乘数效应大于 1。对农村资本的补偿政策在前期缩小了城乡消费差距并在中后期出现了效果反弹,而对农村劳动的补偿政策则持续扩大了城乡消费差距,在投资方面,两种补偿政策都在前期扩大了投资差距,而在中后期显著缩小了城乡投资差距,且在中后期政策乘数效果大于 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生产性支农政策在中长期刺激了产出差距降低,并持续地降低了城乡消费和投资差距,但政策影响的乘数效应小于 1。

在政府性基金支农方面,土地出让收入城乡重分配政策在前期刺激了产出差距的缩小但在中后期出现了政策反弹,其持续扩大了城乡消费差距,并在后期缩小了城乡投资差距。通过土地金融等方式募集支农资金的政策在促进城乡产出差距缩小方面效果较好,在前期政策乘数远大于 1,中后期乘数效果衰减,同时该政策持续刺激了城乡消费差异缩小,并且政策乘数始终大于 1。在投资方面,这种政策在前期显著扩大了城乡差距,在后期缩小了城乡投资差距。通过地价上升募集支农资金的政策选择扩大了城乡产出和消费差距,在前期缩小城乡投资差距的同时在中后期造成城乡投资差距的扩大。

综合来看,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支农举措对促进产出、消费和投资增加方面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刺激城乡“富裕”方面效果显著,但在实现“共同”方面,针对要素的补贴政策效果相对较短且乘数较小,而生产性支农政策的效果持续时间则相对较长。通过政府基金收入支农的政策选择中,土地出让金城乡重分配有利于城乡“富裕”的实现,并且在短期内缩小了城乡产出差异,而通过土地出让增量资金的政策选择中,土地金融支农则在促进城乡“共同”和“富裕”中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而通过地价上升募集资金的方式则不利于城乡产出增加和差异的缩小。

表 2 财政支农促进“共同”乘数计算表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小值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小值
资本收入 补偿政策	产出 差距	-0.47	1.44	0.88	-0.47	土地出 让收入 城乡重 分配政策	产出 差距	-0.22	0.48	0.28	-0.22
	消费 差距	-0.22	1.11	0.41	-0.22		消费 差距	0.02	0.13	0.07	0.02
	投资 差距	1.63	-1.50	-1.08	-1.95		投资 差距	1.23	-0.59	-0.10	-0.59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小值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小值
劳动收入 补偿政策	产出 差距	-0.67	2.22	1.22	-0.67	土地金融 支农政策	产出 差距	-2.33	-0.45	-0.96	-2.33
	消费 差距	0.38	1.69	0.98	0.38		消费 差距	-1.67	-1.25	-1.45	-1.67
	投资 差距	3.19	-2.55	-1.00	-2.60		投资 差距	3.69	-0.96	0.17	-0.96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小值			第一期	第十期	平均	最小值
财政预 算内收 入支农 政策	产出 差距	0.09	-0.16	-0.09	-0.16	土地价 格上升 支农政策	产出 差距	0.23	0.05	0.10	0.05
	消费 差距	-0.01	-0.04	-0.03	-0.04		消费 差距	0.17	0.21	0.19	0.17
	投资 差距	-0.47	0.19	0.03	-0.47		投资 差距	-0.42	0.18	0.00	-0.42

## 六、政策建议

在城乡二元经济格局下促进共同富裕,需要中央和各级财政统筹合理分配财政支农资金,围绕共同富裕对财政投入力度的要求,营造城市繁华、农村繁荣的良好态势,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衔接的过渡期内,要做好财政投入政策衔接,优化支出结构,调整支持重点。从长期来看,城乡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形成了挑战。从城乡结构上看,目前我国城乡经济对比状况主要有城强乡弱、城弱乡弱、城强乡强的结构,但总体来讲,城强乡弱的经济状况是在大部分地区特别是经济取得了一定发展的地区普遍存在的情况,而本文也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情况进行分析。我国不同区域城乡发展状况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不可能存在一个绝对普适的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标准答案,但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是现有财政资金城乡分配状况进一步扩大了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并且巩固了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而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则一定要解决这一突出存在的问题,这要求政府通过推进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促进农村地区发展,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在兴农政策的实际实施中,地方政府要遵循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原则,根据不同区域发展状况,参考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依据自身财政收入结构和数量,结合当地城乡产业结构特点、自然资源禀赋、交通位置、城乡居民生活需求等进行综合研判,通过将财政资金有效落实到有利于农村农业发展的具体项目上,实现城乡支农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在这个基础上,针对城乡经济结构的普遍性,对政府的财政支农举措实施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改善当前财政支农资金结构。根据支农政策对总体及城乡各部分产出、消费和投资的不同影响,在现行财政政策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资金支持的基础上,强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补偿政策的效用,加大针对农村劳动收入财政支农资金的发放力度,将支农的重点由生活扶助转变为生产扶持,并更多通过土地抵押融资等金融方式增加土地出让收入,充分发挥土地金融等财政政策对总产出、总消费及总投资的正向影响。同时调整支农资金核算方式,对产业发展、生产直接投入等资金单独核算,将农业发展与地方官员考核挂钩,以制度保证地方财政配套落实农业生产

资金,保证农业农村支持资金落实到位。提升财政支农的资金使用效率,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跨行政职级的沟通机制,建立系统有效的财政支农惠农体系。

适时对财政补贴政策做出动态调整。随着城镇化不断发展,财政惠农政策调整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政府应在市场条件和外生冲击发生变化时适时对支持农业发展的财政补贴政策做出动态调整:一方面,财政相关政策调整应做到因时、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区在不同时间段内对相同类型财政补贴政策调整的敏感程度的不同,基于财政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制定差异化的财政补贴政策并提出相应配套措施;另一方面,应进一步精细化补贴,强化针对农村要素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补贴政策效果,发挥政府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实现产业发展与当地的经济社会条件相匹配,农村经济发展与当地经济实际相符合,从而更好地促进农村消费和投资水平的增加,达到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

坚持增量财政资源的农村偏向配置,做好存量财政资源城乡配置调整。扩大对农业农村的财政支出规模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着显著影响,特别是农村倾向性增量财政资源配置可以有效弱化当前城乡二元化经济发展格局,推动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实现。各地政府应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一方针进一步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从解决体制障碍和财政资源倾向城市问题入手,以土地出让收入的城乡分配为索引,加大财政的定向化补贴力度,以培育产业为导向,以建立现代化农业为目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应进一步调整土地出让收入存量城乡分配结构,培育农村要素市场,促进要素资源城乡流动,协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化。

破除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壁垒。从目前财政支出范围来看,公共财政基本涉及了农村所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但由于投入相对城市仍显不足、整体覆盖力度不够等因素限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城乡结构壁垒是造成居民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重要原因,应采取政策措施破除城乡结构壁垒,优化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在全体居民之间的配置状况,努力克服财政支出中的城市倾向性。将政府在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责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其对各级政府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大力支持一般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业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的各项补贴力度。加强对农村非生产性公共服务供给,推广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及重大农业科技成果应用,推动地方范围内农业科技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实现公共财政合理分配。□

#### 参考文献:

1. 陈昌兵. 可变折旧率估计及资本存量测算[J]. 经济研究, 2014(12): 72-85.
2. 高帆,李童. 中国城乡资本流动存在“卢卡斯之谜”吗[J]. 经济学家, 2016(03): 75-86.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课题组,叶兴庆,徐小青. 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突出矛盾与未来走向[J]. 管理世界, 2014(09): 1-12.
4. 李普亮. 财政农业支出、农民增收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 南方经济, 2012(08): 57-75.
5. 梁红梅,张卫峰. 中国消费、劳动和资本收入有效税率估算研究[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4(12): 3-12.
6. 罗东,矫健. 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影响实证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12): 48-53.
7. 马晓河. 转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8. 聂海峰,岳希明. 间接税归宿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13(01): 287-312.
9. 饶晓辉,刘方. 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的实际经济波动[J]. 经济研究, 2014(11): 17-30.
10. 饶晓辉. 政府支出融资方式的增长效应与福利效应[J]. 当代财经, 2017(08): 14-25.
11. 孙秀林,周飞舟. 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一个实证解释[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04): 40-59.
12. 陶然,徐志刚. 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一个转轨中发展的大国视角与政策选择[J]. 经济研究, 2005(12): 45-56.
13. 王文甫,王召卿,郭铃沂. 财政分权与经济结构失衡[J]. 经济研究, 2020(05): 49-65.
14. 许光建,卢倩倩,许坤,张瑾玥. 我国土地出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历史、现状及展望[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0(12): 4-9.

15. 张明源,薛宇择. 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结构性减税与最优政策选择[J]. 南方经济, 2020(12): 38—54.
16. 朱军,许志伟. 财政分权、地区间竞争与中国经济波动[J]. 经济研究, 2018(01): 21—34.
17. 朱迎春. 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J]. 当代财经, 2013(09): 39—48.
18. 曾国安,胡晶晶. 论中国城市偏向的财政制度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J]. 财政研究, 2009(02): 36—39.
19. Michael P. Evers. Fiscal Federalism and Monetary Unions: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 97(1): 59—75.
20. Andrew Mountford, Harald Uhlig.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Shocks? [J]. Humboldt University, Collaborative Research Center, 2005: 649.
21.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M]. The MIT Press, 2006.
22. Andrés Rodríguez-Pose, Daniel Hardy. Addressing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Rural Economy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J]. Applied Geography, 2015, 61: 11—23.
23. Sato Ryuzo, Davis Eric G. Optimal Savings Policy When Labor Grows Endogenously[J]. Econometrica, 1971, 6(39): 877—897.
24. Jingzhong Ye. Land Transfer and the Pursui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2015, 15(3): 314—337.
25. Sarah Zubairy. On Fiscal Multipliers: Estimates From a Medium Scale DSGE Model[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14, 55.

## Will Financial Support for Countryside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 ——Research on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Based on Urban-Rural Heterogeneity

SONG Yong-hua<sup>1</sup> CHEN Chang-bing<sup>2</sup> YANG Xiang-xue<sup>1</sup>

(1.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02488;

2.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00836)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Under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how to implement financial measures to revitalize the countryside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economic reality of the dual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 model with government involved. With the help of policy impact response and multipli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of government general public budget expenditure and government fund budget expenditure on promoting urban-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economic ga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gricultural support policy of general public budget expenditure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and the government fund expenditure is more effective in supporting agriculture. The effect of polic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ay of fund-raising. According to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economic model and the specific reality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the author propounds that we should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countryside, improve the current financial support for countryside fund structure, and make timely dynamic adjustment to the financial support for countryside subsidy policy,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countryside and better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Heterogeneity of Urban and Rural;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Heterogeneity DSGE; Policy Multiplier